

民国清流

——那些远去的大师们

汪兆骞 ◎著



看书扫这里

和阅读方式：

编辑短信 **搜民国清流** 发送至10658080

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民国清流

——那些远去的大师们

汪兆骞 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清流:那些远去的大师们/汪兆骞著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 2015.8
ISBN 978-7-5143-3812-6

I. ①民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文化—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
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2918号



民国清流:那些远去的大师们

作 者 汪兆骞
责任编辑 张 霆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*1000mm 1/16
印 张 23.25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3812-6
定 价 49.8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第一章 民国六年（1917）/001

陈独秀、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，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。二人先后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《文学革命论》，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，一个崭新的《新青年》时代呼之欲出。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。李大钊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，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，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。

第二章 民国七年（1918）/063

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，北京的新文化运动，却有一抹春色。《新青年》改组为同人刊物，由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、钱玄同、沈尹默、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，请撰稿人周氏兄弟、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。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《狂人日记》等小说，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、气象、精神、灵魂，焕然一新。胡适、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、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。

毛泽东创办《湘江评论》，写《民众大联合》，胡适高度评价云：“一篇大文章，眼光很远大，议论也很痛快，确是现今重要文字。”

李大钊与胡适开展“问题与主义”的学术讨论，陈独秀、毛泽东、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。

陈独秀、李大钊办《每周评论》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、邵飘萍等办《京报》《时报》等，掀起舆论波澜，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。

第三章 民国八年（1919）/095

民国八年（1919），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。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。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，集体亮相，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，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，一路高歌猛进，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。

第四章 民国九年（1920）/141

民国九年（1920），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（1919），少了些红火，但并不沉寂，“五四”余波仍在荡漾。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，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，也日趋激烈。陈独秀、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，宣传马克思主义、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。胡适出版新诗《尝试集》，成为“新诗老祖宗”，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《争自由的宣言》，为争自由而战。鲁迅进北大当讲师，讲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他对盲目引进“俄国思潮”，有振聋发聩的回答：“中国人无感染性，他国的思潮，甚难移植（《致宋崇义》1920年5月4日）。”周作人作《人的文学》《平民的文学》《思想革命》，提倡“为人生的文学”，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。

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《新青年》时代接近尾声。

第五章 民国十年（1921）/171

民国十年（1921），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，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。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“个性解放与自由”的旗帜，而部分人放弃“五四”个性主义，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，

创立了中国共产党。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，青史留名。

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/ 191

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，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。1月19日，武汉酷寒，天降大雪，冻死很多人。4月直奉战争爆发，在这场血战中，百姓生命惨遭屠戮。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，炮轰总统府，局势动荡混乱。同时，文化界和舆论界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，却是这一年的主题。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，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，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，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。

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/ 223

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的第一天，孙中山发表《中国国民党宣言》，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。二十六天后，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。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：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，双方认为，“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，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，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”。

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，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。10月28日，孙中山任命廖仲恺、李大钊、汪精卫、张继、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，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。

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。其通过“取缔新思想”议案，控制舆论。2月7日，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，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，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。惨案发生第二天，吴佩孚就以“鼓动罢工，扰乱社会秩序”罪名，查封了汉口《真报》。2月16日，中共的《向导》遭查封。四月因林白水在《社会日报》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，该报被封，林被监禁三个月。8月27日，天津的《京津泰晤士报》也因反对曹锟贿选，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。10月，上海的《时报》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……

1923年，知识分子与当局的“不合作宣言”，成了主旋律。

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/ 257

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，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——齐卢之战，直奉火并……百姓饱受战乱之苦。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，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，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。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，终于改组了国民党，确定了“新三民主义”和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，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，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。

是年的民国清流，除共产党人陈独秀、李大钊、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，更多人也怀着希冀，以文学为武器，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。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。可悲的是，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，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。

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/ 279

1924年12月31日，孙中山扶病入京，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。其入京后发表《入京宣言》，称“乃为救国”，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，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“善后会议”如期举行。

3月12日孙中山逝世，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，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。

巨星陨落，举国哀恸。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。4月，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《管理新闻营业规则》控制言论，遭到胡适、陈西滢、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。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，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，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。

是年5月30日，爆发五卅惨案，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。6

月3日，郑振铎、茅盾、叶圣陶、胡愈之等创办《公理日报》。瞿秋白主编的《热血日报》面世，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《京报》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《京报副刊》，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，进行反帝宣传。

知识分子反专制，争自由，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。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，“认定改造人心——思想革命，是急务中的急务”的《晨报》，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，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。

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，你会悲哀地发现，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，陈独秀、胡适、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、思想、文化的纷争，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。

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/ 309

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、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。惨案继续不断发生。

3月18日，段祺瑞悍然枪杀四十七名、伤二百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。“三一八惨案”发生后，邵飘萍、成舍我主办的《京报》《世界日报》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，严厉谴责这场杀戮。

朱自清、鲁迅、周作人、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；王世杰、高一涵、许士康、陈翰生等在《现代评论》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。上海的叶圣陶、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。

张作霖、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，杀气腾腾入京，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。《京报》《社会日报》随之被查封。鲁迅、蒋梦麟、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。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，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，无私无畏。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，表达道义立场。梁启超、胡适、徐志摩、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、风雨晨昏中，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……

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/ 339

1927年，从北京到南方，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。

义士喋血，大师殒命。

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，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，英勇就义；白发书生王国维，自沉昆明湖，国之魂消；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。三位文人精魂美魄，如火如荼。

空前屠杀，鲜血成河。

北伐军席卷江南。“四一二”，上海宝山路再次被鲜血染红。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民众开枪，“伤毙至百余人”。郑振铎、胡愈之、章锡琛等联名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、吴稚晖等，发出抗议之声，并于4月15日在《商报》发表。

广州的共产党人萧楚女4月被杀狱中，赵世炎、陈延年被杀于上海，共产党人李汉俊、《大江报》创始者詹大悲遇难于武汉。

作家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成舍我、章乃器、周作人都以笔为武器，批评时政，激浊扬清。4月26日，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写信给胡适：“时局混乱已极，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，兵祸党祸，几成恐怖世界，言论尤不能自由。”

是年，中国政局发生巨变，“北伐”成功已成定局，国共两党分裂也成事实，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。而文化界却依然是纷纷乱象，创造社、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，鲁迅与其他学者、作家的争斗也从未停止。

第一章

民国六年

(1917)

陈独秀、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，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。二人先后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《文学革命论》，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，一个崭新的《新青年》时代呼之欲出。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。李大钊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，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，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。

1

民国五年（1916）岁尾，有几件大事发生：10月31日，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在上海病逝，终年42岁。八天之后，护国军之父蔡锷病逝日本，年仅34岁。11月12日百名参、众两院议员，要求定“孔教”为“国教”。康有为在报上公开发表致总统、总理书，要求“以孔教为大教，编入宪法，复祀孔子拜跪”。国会宪法审议会开会审议宪法草案条文时，“孔教”能否定为“国教”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。

12月21日，《中华新报》北京专电：“蔡子民先生于（12月）21日抵北京，大风雪中，来此学界泰斗，如晦雾之时，忽睹一颗明星也，先生现暂居观菜园陈宅。”

26日，被北洋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的黎元洪，刚在东厂胡同官邸宣布就职大总统后，正式任命单枪匹马只身北上的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。这就是说，他将要主政由大清朝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全国最高学府。

其实，三个月前，蔡元培在旅法时，就接到驻法国公使转来教育总长的电报，是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后的继任者范源濂发来的。这位肝胆相照的老朋友，在电文中充满了敬仰之情：

国事渐平，教育宜急。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，师表群伦。海内人士咸深景仰。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，务祈鉴允，早日回国，以慰瞻虑。君行在即，先祈电告。

蔡元培接到电报，乘法国邮轮11月8日抵达上海。翌日赶到福开路黄兴灵堂吊祭。又接到蔡锷去世的噩耗，他与上海的革命党人，都沉浸于一片悲痛之中。

蔡元培与孙中山、唐绍仪、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，是以主丧友人的名义，主持黄兴悼念活动的。

辛亥革命后，大总统宝座拱手相让，又痛失宋教仁、黄兴这两位文武主将，孙中山悲痛至极，神情黯然，面容憔悴。蔡元培见之，自然也心情沉重。但孙中山能以“毁党造党”的气魄解散同盟会，重建国民党，那么以他屡战屡败的摄人魂魄的浩然之气，再造共和伟业，充满希望。

望着面前这位身材不高，留两撇威严口髭的伟人，蔡元培决心与他干一番宏图大业。

蔡元培离开上海前夕，上海的《民国日报》发表了一篇昔日旧友，为他北上就职北京大学校长的鼓励诗：

居官三月掉头去，更挈书囊驾海行。
坐惜斯人挟悲悯，不应长作老书生。

火车在冬季空旷的原野上，不快不慢地行驶，蔡元培凭窗远眺。他赴京就北大校长职，多数朋友不赞同，广西马君武就劝他不要去蹚这池浑水。那北京大学的腐败尽人皆知，民国以来，走马灯般不知换过几任校长，又有何人全身而退？那胡仁源实在当不下去，连忙告饶抽身，算是聪明之择。你乃前清翰林，若整顿不好，可败坏一世清名。

然而，孙中山先生支持他办教育的话，却声如洪钟，在耳际回响。在那个夜雨萧瑟的晚上，在中山先生的寓所，先生用惯有的平和语气，精辟地分析起时局，谈到教育时说，“中国自古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，依我之见，现在倒是相对平静的时候，黎元洪为了得天下，还得借用各种政治力量。所以，是你办教育，我们趁势发展力量的最好时机。你几次出国，考察西方教育，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，你应该去北大，我支持你”。

想到这里，中山先生那略显威仪的脸庞，特别是清澈得如一泓秋水般的双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不知为什么，在自己人生困顿、彷徨乃至灰心的时候，想起影响 20 世纪中国命运走向的伟人清澈又坚毅的眼睛，就激奋自信起来。

2

蔡元培从前门火车站走出，惊喜地看到，一场北方弥天大雪，覆盖了凝聚千年燕云皇气，却已萧瑟落寞的帝京。

12月25日清晨，几缕晨阳穿透浓重的阴云，投射到景山西侧一片宽绰的宫殿式的建筑群上，高大殿脊上的积雪，映出耀眼的红光。这里就是由和嘉公主府旧府改建成的北京大学校址。当年，一心要变法的光绪皇帝，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，于1889年“百日维新”时，下诏拨和嘉公主府做中国第一所皇家大学“京师大学堂”校址。

和嘉公主生于乾隆十年（1745），是乾隆与纯惠皇贵妃苏佳氏的四女儿，16岁花龄下嫁给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隆安。赐地明御马监马神的旧祠马神庙路北，建皇家和嘉公主府。可怜公主红颜薄命，23岁便香消玉殒，此处堂皇的公主府也日渐荒芜。二十七年后，历史在此选择这座弥漫着“乾隆气”的和嘉公主府做中国第一座国立大学，并在一年之后，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五四运动的精神高地。

冒着零星的小雪，蔡元培独自一人，久久徜徉在马神庙，心情复杂地凝视着暮气沉沉的北大。然后悄然走进昔日的皇家“京师大学堂”。作为前清的翰林和民国教育总长，他是很熟悉这里的。

辛亥革命后，蔡元培曾一度主持教育部，将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国立北京大学，并推荐严复为第一任校长。在蔡元培的主持下，制定了废除忠君、尊孔，合并经科、文科之《大学令》。但袁世凯千方百计破坏北大的建设，曾两次以经费不足为由，提出停办北京大学。同时又玩弄伎俩，要封校长和教授为什么“中大夫”及“下大夫”的把戏，遭到严正拒绝。当袁准备举行“登基”大典丑剧时，北大师大群起反对，文科教授马叙伦愤然挂冠而去，为京城朝野称颂。

北京大学在动荡的政局下，一片乌烟瘴气，名声狼藉。教师中不少人靠印

发旧讲义，糊弄学生。学生中有不少人整天吃花酒、捧戏子、打麻将，不上课，不读书，混日子。北京大学所处的马神庙、沙滩一带，成了市井闹肆、酒楼，暗娼招摇过市，与文化圣地形成绝妙的讽刺。

如今，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，再次走进军阀盘踞下的日渐颓败衙门式的旧大学堂、眉宇间还是泛出凝重的忧虑。

校门坐北朝南，有两只苍老却威猛的石狮，蹲守在大门两侧，门头上依旧高悬“大学堂”三字匾额。进门，虽然大雪遮盖了小院，但那不小的荷塘，前立一日晷，石柱上刻有篆文，不远处有一棵苍古的老槐，却清晰可辨。往北，有五间高大殿宇，乃公主府正殿，上方的藻井与殿柱，虽油漆早已斑驳，但依然一派皇家气象。走过组组建筑群，来到后院，有座两层砖木楼房，原是公主楼，改为京师大学堂后，已成为藏书楼。往西，有几进宽敞大屋，昔日公主在此起居，现改成学校办公的地方。

和嘉公主府改成京师大学堂后，几经扩展，至北京大学建立，已将周边的汉花园、松公府划为校址。今年9月，校方又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，准备在校门处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“红楼”。想到这里，蔡元培脸上似又浮起欣慰的微笑。

蔡元培重新回到校门口时，突然发现一排校役整齐地列队在大门两侧，脱帽向他鞠躬行礼。他们得知校长在东方未曙时已进校，便自动提前上班，聚在校门口。蔡见状，也忙脱帽向他们一一鞠躬还礼。从此，每天蔡校长遇到校役或师生向他致敬，他都会郑重地对他们鞠躬回礼。从这件小事，人们欣喜地看到，校长给封建习气浓重的旧北京大学带进一缕平等、民主之风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，平等、民主、自由之风不仅鼓荡在北大校园，还强劲地涤荡整个旧中国……

3

翌日，黄包车跑过雪后明丽阳光下的前门城楼，碧瓦上积雪灼灼闪光，刺得蔡元培睁不开眼。不一会儿，黄包车就停在前门外一家旅舍门前。陈独秀早

在那里等候多时。于是，就有了一位前清名翰林，一个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，在分别一个年轮后具有历史意义的重逢。

陈独秀见到蔡元培，向前跨了一步：“蔡先生吧，多年不见，风采依旧啊！”

蔡元培两眼闪光：“啊，仲甫先生，乱世重逢，幸哉幸哉！”

二人手拉手走进旅舍客房，两手烫人，面色潮红。坐定后，彼此微笑相视，极富语言天赋的老朋友，一时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。但十多年的往事，却瞬间涌上心头。

1904年秋，一批从日本留学归国，志在推翻清廷的文人，在上海法租界余庆里、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里，成立了暗杀团。蔡元培、陈独秀这对爱国学社的师生参加了暗杀团。加入暗杀团，像会党结社般“歃血盟誓”。

那天，他们一伙文人，跪在供奉皇帝的牌位前，由何海樵领着众人宣读誓词。然后杀鸡滴血于酒中，再各自用刀划破无名指，将血和血酒搅在一起。每人痛饮三口，豪情万丈，义无反顾。

他们早已在日本横滨秘密建立炸药制造所，研制炸药。归国后，蔡元培发展上海爱国女校化学老师钟观光和俞子夷，制出威力很大的毒药。但考虑使用不便，转向研制炸药，当时加入的有刘师培、章士钊。章士钊又拉来陈独秀。有了炸药，拟订刺杀慈禧。于是北下京城，在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，潜伏了近五个月。终因防备森严，经费耗尽，返回上海。

其实，蔡元培早就心仪陈独秀，陈独秀在上海办《俄事警闻》时蔡元培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过陈独秀。后陈独秀在芜湖办《安徽俗话报》。蔡元培听说，后来出资人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，全凭陈独秀独木苦撑了几个月，对其敬业精神十分钦佩。

谈到这里，陈独秀忙从里屋拉出汪孟邹。向蔡元培介绍：“讲起办报，全凭孟邹兄撑腰。”蔡元培知道汪乃上海滩的报界闻人。他与陈独秀是同乡又是密友。

1903年夏，章士钊办的《苏报》被查封后，几经奔波又筹办了《民国日报》。当时，蔡元培也在上海，章士钊对他说，他和陈独秀蛰居昌寿里一间小阁楼上。陈独秀足不出户，又撰稿又搞编务，经常彻夜工作。一日，章士钊忽闻异味，

竟是从蓬头垢面从不换洗衣服的陈独秀身上飘来。他忙走近老友，见陈独秀肮脏污黑的衣领上竟爬满虱子。

汪孟邹在安徽芜湖办《安徽俗话报》时，陈独秀更是夙兴夜寐，是报社最为繁忙辛苦的一位。汪与陈的相识也颇有趣儿。一日，汪孟邹正在科学图书社办公，忽有一位剪了辫子、披着半长头发的青年，背着包袱，手执雨伞闯进来，说是要来办报。汪一怔，见面前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中等身材，面色黝黑，两唇宽而红润，双目炯然放光，自报陈独秀。汪告诉他，这里一日两粥，清苦得很，他却说，有粥就好。当时芜湖尚无印刷厂，稿子编好后须到上海印刷，印毕再寄回。报纸一到芜湖，陈独秀包揽了分发，打包、邮寄，麻利而尽职。一次，因有事，汪曾到他的小屋找他。见墙上挂着他写的一副对联：

推倒一时豪杰，扩拓万古心胸。

汪孟邹从此对他刮目相看。有如此阔大心胸的年轻人，目前虽破衣烂衫，但前程无限。

汪孟邹的东亚图书社后来得以发展，与陈独秀的智慧点拨有关。自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，曾与柏文蔚有交谊的陈独秀，颇被人看好。朋友都来劝他，出来做官吧。陈独秀却极为冷静地劝诫朋友，这时局不会长久。他颇有眼光地看好办报开书店，劝朋友凑股去办。

陈独秀日夜都梦想着革新大业，这几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，要救中国，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，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。他趁着酒力，找到汪孟邹说，让我办份期刊吧，我让它名扬天下！

当时，汪孟邹的亚东图书社生意很清淡，章士钊主办的《甲寅杂志》由汪孟邹承担，财力已拮据，无力再办期刊，但他相信陈独秀的眼光和能力，就去找同业好友益群书社的老板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，他们很感兴趣，于是承办了陈独秀主办的《青年杂志》。后因陈子寿觉得刊物名称与上海的《上海青年》雷同，和陈独秀商量后，改《青年杂志》为《新青年》。

因陈独秀而有《新青年》，因《新青年》而陈独秀名满天下。